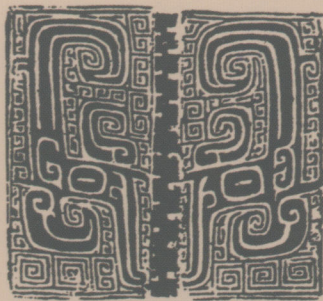


中国史学史

第一册

杜维运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史学史

18

第一册

杜维运 著

K012

D868

商务印书馆

2010·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史(全三册)/杜维运著,一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0

ISBN 978-7-100-05646-5

I. 中… II. 杜… III. 史学史—中国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531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史学史

(全三册)

杜维运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5646-5

2010年7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31½

定价:72.00元

谨以此书献给孙雅明女士

阎 序

为大学同窗好友杜维运教授的精心大著《中国史学史》写一篇短文,以表述读后心得,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承诺。现在这部共有三册的巨构已经大功告成,如果诺言未践,有愧于友,只好不避浅陋,写出一些感触和佩服的话语。

与维运兄相识相知五十多年,深谙他之所以能在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上做的得心应手,成就辉煌,是因为具备了三个令人羡慕的优异条件:其一是专注于一,心无旁骛。维运兄沉浸于史学的开拓与享受,数十年如一日,不仅未曾离开这个园地一步,而且不受任何名利的诱惑,致使教学与研究受到不利的影响。记得在他盛壮之年时,某著名大学进行安排他做系主任一事。此一讯息传达给他时,便遭到坚定的拒绝。如此执著于学术而不稍分心,是像我这样凡俗之辈不可能做到的事。其二是治学有方向,不见异思迁。从大学到研究所阶段,维运兄就开始对赵翼《廿二史劄记》的考证与清代乾嘉史学的研究卓然有成。在大学执教后又撰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及《史学方法论》等著作,风行既久,亦广受欢迎,而在国外并获得国际史学界的推崇与肯定。其三是笃信历史知识的可贵与其无可取代的功能。维运兄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经验的累积与文化遗产的精粹,可以说是人类知识的宝库,故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便能增长人的智慧

II 中国史学史

与才能。古代熟悉罗马扩张史的波利比阿(Polybius, 200—122B. C.)曾说:“历史是实例教诲的哲学”,正是同样的确定历史知识不可缺少的重要性。

维运兄忧心于社会的纷扰、人心的不安与史学发展的方向狭隘而偏颇,期望史家都发挥淑世的精神。一部人类文明史的演进,说明了竞争与合作并行和个人与人群同在的必要性。所以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不是只为竞逐名利与满足私欲,而是对社会的和谐与人群的精神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虽然历史的记述中,有善与恶、是与非、正与邪、忠与奸的事例,但历史知识给我们的启示则是必须符合道德的目的与社会的伦理,强制他人如何行为以及个人无限制的放纵,都是错误的认知与不当的作为。所以轻视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与误解历史的功用,都必须引以为戒。史学史为了解史学的内涵与发展的入门之学,也是进入历史知识堂奥的基础之学。有人对历史只学皮毛,未求究理,如此非但对人群社会无益,尤其有可能带来伤害或灾难。

年少时阅读数位前辈史家所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书籍,内容大致不外对历代著名史家的生平事略、著史体裁及书中内容,作概要式的介绍。至于时代的脉动、学术思想的潮流、史著内容的分析与批评、与世界史学如何接轨,则着墨很少,致卒读之后总是兴犹未尽,缺少了点求知的满足感。以后翻阅到浦立本和毕士利(E. G. Pulleyblank and W. G. Beasely)两位教授合编的《中日史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一书及维运兄所著《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书中一六〇至一六八页,论述这两位英国史家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见解,其中浦立本教授还是维运兄

在剑桥大学的业师),才算茅塞顿开,领悟出中国传统史学坚实的基础与辉煌的成就,也激发起我对史学史、史学方法、历史哲学以及文化史作进一步充实与探讨的兴趣。虽然因此将自己陷入一个错综复杂的学术困境,在史学的工作上事倍功半,甚至是只有耕耘,很少收获,不过三十余年来乐此不疲,宿愿未改,也可美其名是一种固执与坚持。维运兄对于中西史学与史学史的造诣兼通互融,广征博引,深厚的学养,识者无不敬服。我自己的注意力则比较重于西洋史学,故无法如维运兄一样,以学贯中西的实力,随心所欲地作中西比较,相互对照,并且常以世界史学的宏观,评鉴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定位。

维运兄的三册《中国史学史》巨著,分别于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八年、二〇〇四年出版问世。第一册由夏、商、周起迄于东汉;第二册由魏、晋、南、北朝迄于唐代之结束;第三册由宋代起迄于十九世纪初。虽然平均五六年成书一册,但还须把之前三十余年的搜集与功力同时计算在内。如果必须为维运兄挑选出一部代表作,《中国史学史》当然应属首选。宋代司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年)穷十九年的岁月,在一群襄助者的帮忙下,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但时已年老体衰,两眼昏花,其辛苦固可得而知。维运兄以一人之力,历十七年完成此一巨著,其勤勉、才华与毅力诚然令人惊叹,他的体魄健壮、思考敏锐,更有上苍独厚的天赋异秉。

历史知识有鉴古知今的功用,因是人不能忘本,也不可不知往事。观念论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 F. Hegel)倡言,历史演进的关键在自由的实践,而欲对历史过程寻找合理的解释,必先了解过去并且重视过去。在维运兄的心目中,史家个人应具有

IV 中国史学史

温文儒雅、和蔼敦厚的性格，而史著的典型须展放出真与善之光芒。当我们阅读《中国史学史》以及他的其他论著时，好似时常产生这样的感觉与互动，如同品尝珍饈般的回味无穷。不过维运兄的治学风范也有波涛汹涌、豪气干云的一面，当他论及史学的兴衰、史家的表现、政治的良弊、伦理的沦丧、道德的堕落时，却好像雄狮般的怒吼，让我们见识到一介书生爆发出来的英雄气概。

阎沁恒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二日

于台北市文山区木栅

自序

人类异于其他万物，由于人类珍视其过去，留下了一部用文字写成的历史。万物皆有其过去，人类以外的万物，任由其过去如泡沫般消逝，不留痕迹。人类则用文字记录其过去，于是留下一部极为珍贵的历史（人类未发明文字以前，已用各种方式留往事，结绳即为其一）。这一部历史，与人类真正的过去，虽非尽合，却有其相当的真实性和珍贵性，其珍贵亦在其具有真实性。古今中外史学家所兢兢业业，所惨淡经营，往往为追寻历史的真实程度。求真于是变成史学上的第一要义。不真的历史，如虚幻的楼阁，意义毫无。可是，真的历史，有待美与善的历史相辅翼。历史而流于“断烂朝报”，历史而变成“人类罪恶、愚昧与不幸的记录”（Edward Gibbon 语），历史的景象，是“人类愚蠢、蛮横、贪婪与邪恶的一幅景象”（Immanuel Kant 语），历史之有，反不如其无。所以史学家须在真的历史上，进一步写美的历史、善的历史。历史的文字，优美典雅；历史的内容，翔实生动；渊博的学术，精湛的文化，自历史而展现；知识的火炬，智慧的光芒，从历史而散发；善恶邪正，真伪是非，圣贤豪杰的光明磊落，巨奸大恶的残暴淫邪，皆现于历史。历史造福于人类者，又岂笔墨所能道尽！“述往事，思来者”；“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癉恶，而为法戒于万世”；“君举必

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典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历史多着眼于对后世的惩戒，人类的文明，将自此而现曙光。所以写真的历史以外，进一步冶真善美于一炉，是史学上的盛事。

人类是有罪恶的，有时是愚昧的，有时是不幸的。但是人类有时洋溢着灿烂的才华，有时开创出自由、富庶、和平、安乐的时代，其善良也足以掩其罪恶。历史而变成“人类罪恶、愚昧与不幸的记录”，不是整个历史的真实，而是出于史学家有意无意的制造。史学家将目光集中于人类的罪恶、愚昧与不幸，奋笔畅写，而尽弃人类善良、聪明与幸福的事实，历史又怎能不变成人类罪恶、愚昧与不幸的记录呢？历史的景象，又怎能不是“人类愚蠢、蛮横、贪婪与邪恶的一幅景象”呢？杜兰夫妇（Will and Ariel Durant）在写完其大著《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以后，曾这样写着：“在战争与政治的大红正门后面，在不幸与贫穷以外，在通奸、离婚、谋杀、自杀之余，千万人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夫妻恩爱，男女敦睦，与子女同喜忧。即使在记录下来的历史上，我们发现太多善良（goodness）的实例。……慈悲的禀赋，与战场及牢狱的残酷，差不多是平衡的。在我们简单的叙述里，很多次我们看到人们互相协助。”“谁敢来写一部人类善良（human goodness）的历史呢？”（Will and Ariel Durant, *The Lesson of History*, 1968, p. 41）看到历史上光明的一面，而感慨无人敢写一部人类善良的历史，这真是历史的悲哀了！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是大史学家的本领；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事

实,写成一部历史,是大史学家的识见。史学上最关紧要处,是史学家的胸怀与识见。史学家具有淑世的胸怀,卓越的识见,衡量于历史事实的真伪虚实,斟酌于历史对当代与后世所发生的影响,精选真善美的素材,以写成其历史,历史将是人类的福音,而不再是掀起人间腥风血雨的号角。史学,史学,孰重于此?!

中西史学,皆有两千年以上的发展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西史学界皆认为史学已发展到极盛时期,于是有现代人所引以为荣的现代史学出现。现代史学所极端致力者,为用科学的方法以求真。为求真,历史的文字,可以拙劣;历史的内容,可以枯涩;历史的褒贬,被认为是史学的糟粕;历史的教训,已沦于史乘的末务;相对的观念充斥,绝对的善恶邪正,真伪是非,不见踪影;偏私的理论横陈,历史事实降落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学术、文化的精华,不见于历史;知识、智慧的灯塔,自历史而灭熄;其尤甚者,为快意撰写人类罪恶的历史,惟恐其不详不尽,惟恐其流传不广。所谓现代史学如此,其流所极,历史已不再是引人入胜的作品,历史已失去维持人类文明的功能,历史对邪恶人所起的阻吓作用失效了,历史所拥有的神圣、高贵、威严的地位丧失了。挥拳于庙堂之上,谩骂于国会之中,状若猛虎,声似豺狼,而丝毫不惧恶名留于万古,且自以为得计。历史,历史,今日已丧其元;成为时尚的现代史学,今日已现重重危机!

为挽救现代史学的危机,须自史学史的研究与撰写起。发展两千年以上的史学,是历代无数史学家竭尽智慧呕尽心血所留下的结晶。其富有真理处,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而永远有其价值;其因时代变迁而价值转变者,亦可就时代与史学的关系,测出史学消长的消息。以中国史学史来讲,春秋大一统之

义,维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统一与强大;为近人所讥讽的褒贬史学,对中国的文明,发挥了无法估计的维持功能;数千年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是史学上的不朽盛业;优美的辞令,经世的文章,屡见于史册,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史记》文笔的恢宏,《汉书》措辞的温雅,无损其叙事的真实;《左传》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气氛,《资治通鉴》所表现出来的磅礴浑厚气象,非用现代极为科学的电脑统计与甚为时髦的结构学者的史学理论(structuralist theories of history)所能形成。凡此,足以说明史学不能以现代为绝对,而睥睨千古。史学的进步,是靠累积的,由累积而创出新史学。待新史学出,旧史学仍时时发挥其功能,为新史学作资源。于是史学史的研究与撰写,乃刻不容缓。中外数千年的史学,其演进的情形如何?其内容累积的情形如何?其与历史的发展,是否相通?其对社会人群,是否发生影响?其创获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是否丰硕?这一些,虽皆过去,对于现在与将来,都有作用。作深入的研究,与写成一部体大思精的史学史,是历史工作者的急务之一。维运不敏,窃有志焉。

个人研究历史,忽忽已历四十余年。一九五一年冬天,是我开始对历史发生兴趣的时候。当时所做的赵翼《廿二史劄记》考证的工作,即是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台大历史硕士论文,系以清乾嘉时代的史学为研究对象,全祖望、章学诚、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的史学,完全吸引住我。接着沉醉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史学之中。一九六二年秋,负笈英国剑桥大学,矢志扩充史学史的研究范围,将目光自中国移向西方,凡西方述及史学史与论及史学理论、方法之书,皆搜读之,如醉如痴者两年。归国后先写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以澄清西方史学家

对中国史学的误解,接着撰写甚耗神智的《史学方法论》一书,冀望融合中西史学方法于无间。一九八七年春,开始着手进行《中国史学史》的撰写工作。我的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写成三册。第一个阶段,写先秦两汉的史学;第二个阶段,写魏晋至唐中叶的史学;第三个阶段,写晚唐迄晚清的史学。如此分段,有没有问题,尚待证明。当时我先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差不多用了一年以上的時間,遍读东汉以前的载籍,这是一种“地毯轰炸”的方式,不管经史子集那方面的书,皆不放过,遇有与史学相关的资料,即札记之。西方同时期的史学,亦注意其发展,希腊、罗马的史学,时时涌现脑际,于是倾力先写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一书,以作前驱。其后教学工作颇忙,杂文应酬不断,撰写工作,甚受影响。一九九一年起,排除万难,倾全力撰写,迄今年(一九九三年)盛夏而第一册写成,辛苦之余,欢欣不已!

撰写时的情况,是值得向读者一提的。携资料奔波于香港、台北、温哥华三地之间(先任教香港大学,继任教政治大学,又时游温哥华),风尘仆仆之劳,不用说了。资料的辗转检查,几部史学名著的反复阅读,皆非开始阅读资料时所能意料。以《左传》、《史记》、《汉书》三部书来讲,读过的遍数,无法计算。欲透视其中的史学,非如此反复卒读不为功。史学名著的史学,其精华往往含蕴于其中,而非暴露于其外。涵泳既久,始能窥其堂奥。言及此,对于西方古代史学的了解,实有无限隔膜之感。文字上的障碍,无法从原始的希腊文、拉丁文进窥西方古代史学的精髓,而仅能自英译作品中仿佛其神似,这是无限遗憾的。以致西方近代史学家的研究,变为最主要的根据。如比瑞(J. B. Barry)、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白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

field)、蒙弥葛廉诺(Arnaldo Momigliano)、葛兰特(Michael Grant)、芬利(M. I. Finley)诸家之说,皆屡屡引用,没有这些根据,虽一字之微,不敢妄参末议。自希腊文、拉丁文的著作,认识西方古代史学,此一艰巨工作,谨寄望于后起的英年史学家。

为了写此书,已将中国古代的史事,熟烂于胸中。时时浮现眼前的,不是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和平景象,就是“焚书”、“屠城”、“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的惨剧重演。国家人群的历史如此,个人的历史亦相似。维运生于山东省嘉祥县的一个农村,累代以务农为业,到父亲这一代,营田数百亩,有富户之称。父亲早逝,由母亲经营垦殖。时维运在襁褓,姐姐值幼龄,以教以养,皆靠母亲。母亲不识字,却明大义,有大量,待邻里宽厚,在家中和蔼,从无疾言厉色。维运非务农之才,有读书之癖,母亲让我离家外出读书,不以分别为念。

一九六一年认识了孙雅明女士,一九六四年结为连理,自此已破的家园重建起来。台北市温州街的竹篱茅舍,是三小宗骥、宗兰、宗骥出生的地方;客人来,院中生炭火、煮酒烹茗的情景,犹在眼前。雅明是一个性格爽朗、多才多艺的人,不像能吃苦持家。可是很穷的日子,她丝毫没有怨言;三小都是在她恩威兼施下长大成人。对于我的写作,尤其表现了最大的兴趣。她不是学术界人,却有学术上的才华,欣赏我的《史学方法论》,细读每一章,提出的修正意见,都是极为中肯的。她自嘲是“挑眼专家”!对于我写《中国史学史》,她百般鼓舞,认为是学术大业。为了让我专心,家中的大事小事,都由她一人承担。从生活的安排,到家庭的几次播迁,全不疲我心神,劳我筋骨。优容如此,老杜虽疏懒,岂能不勉力奋笔?所以此刻愿以至诚之心,将这部书

献给她。这部书的第二册、第三册写成，可能已迈入二十一世纪，悠悠岁月，没有她的策励，学术大业，难以完成。先献此书，所以表谢意，亦所以自勉。

东汉末年，蔡邕有“旷世逸才”之誉，尤多识汉事。当系身囹圄之日，曾上书陈辞，乞请“黥首刖足，继成汉史”。未得所请，遂死于狱中。士生二十世纪的今日，得自由写史，又可游走世界，踏遍地球，思想借以抒发，眼界赖之开阔，幸何如哉，幸何如哉！

杜维运自序于温哥华明月轩

一九九三年八月

一九九三年八月在我写此书第一册的自序时，曾预计第二册自魏晋写至唐代中叶。可是经过长时期的研读资料与观察史学发展的情况时，觉晚唐的史学与唐中叶以前的史学，不能分开。一朝一代的史学，有其特殊性与整体性。所以此册仍以晚唐为断限。五代以后，归入第三册。

三年岁月，倾力撰写，艰辛备尝，一旦写成，欢欣无限，而感慨亦随之。中国史学，发展至晚唐，已历时近两千年，其洪流若滔滔江河，其成就远驾西方之上，此为令人欢欣无限者（与工作有成的欢欣相若）。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则治乱相寻、踟躅前进。圣君贤相的惨淡经营，学术文化的灿烂成绩，往往旦夕之间，化为乌有。残贼之人当道，凶暴之徒流窜，“白骨盈积”，“千里无烟”，又岂偶然？董卓死，“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则董卓之恶可知。贞观时代，“言事者，安论纾词，无疑权虑势”，“中书、门下

XII 中国史学史

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则贞观时代，天下大治，外户不闭，不是意外。史学家懔于“人祸天刑”，戒慎执笔，“据事直书”，“善恶必书”，则人类历史趋于文明，或有希望。这是史学所影响于历史者。

谨识于此。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杜维运附述于台北

中国史学史

第一册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引论	9
第二章 史学的起源与史官的设立	32
第一节 民族、文化与史学	32
第二节 东方的史学摇篮	33
第三节 史官的设立	39
第三章 史学原理的出现	50
第一节 纪实	50
第二节 阙疑	55
第三节 求真	57
第四节 怀疑	60
第四章 几部较早的史书与史学的放出异彩	67
第一节 《尚书》	67
第二节 《春秋》	72
第三节 《左传》	82
(一)《左传》的作者问题	83
(二)《左传》叙事的翔实、生动与柔美	83
(三)《左传》的内容	93